

周恩来去世后 90 高龄朱老总恭恭敬敬敬了个军礼

核心提示：

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临近90高龄的朱老总到305医院作最后的告别，他站在周总理遗体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离开时显得心情异常沉重。



7月6日，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病逝。

在我的记忆中，朱老总的病逝起因偶然。6月2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会见的时间推迟又没有及时通知，朱德委员长在有冷气、气温低的客厅里等了近1个小时，以致患了感冒，回到家中就开始发高烧。

住进医院治疗后，朱老总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反而逐渐加重，继而发展到肺、肾等部位并发炎症。从朱老总病情恶化到昏迷期间，中央办公厅、警卫处的部分领导及老同志，到305医院探望了他老人家。

7月5日下午，我和中办警卫处副处长以上干部，去305医院朱老总的病房看望他。看到朱老总插着输氧管微弱地喘息，已经不省人事，阵阵悲痛涌上我的心头，眼泪夺眶而出。站在朱老总的病床前，我不禁思绪万千……

从我参军的那一天起，我就知道朱德是我们所属的八路军的总司令。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是与毛主席齐名的领袖。自己1945年初调到延安中央警备团，担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首长的警卫任务后，曾守卫过中央首长开会、娱乐的礼堂和俱乐部，轮流到各家首长住处站岗，因而有了和总司令见面的机会。

见到朱德总司令本人以前，在我的想像中，总司令应该是个威风凛凛的大人物，可在接触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个和蔼可敬的长者。那时，在办公之余或休息日，朱老总爱到延安附近或劳山去打猎。

解放战争后期，我被选入特别小分队，负责朱老总从西柏坡到华东解放区的警卫工作。我还记得在那次出行中，朱老总在和华东野战军高级将领交谈时那飞扬的神采，那有力的手势。

进北京以后，朱老总住进了中南海，我则调到了公安部，脱离了中央首脑保卫系统，除了在接见外宾的场合，远远地看着朱老总和外宾交谈，就很少有和他接近、见面的机会了。

然而，随着公安部八、九局的合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因为工作的变动，我又一次和朱老总相逢，并面对面地向他致以问候。

那是1973年，朱老总的政治秘书廖盖隆向中央办公厅反映，说朱德处的医护、保健、生活照顾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汪东兴随即指派我到朱老总的住处，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开会加以处理。

我因此两次到万寿路新六所4号楼朱老总住处，请康克清大姐一起开会，商讨如何妥善解决相关问题，最后形成了康大姐和工作人员双方都满意的意见。事后，我给汪东兴写了一份书面的情况汇报。

3月19日那天，我在朱老总公司开完会，到院子里欲乘车返回时，正碰上朱老总在院子里散步后往自家走来。我立刻上前与朱老总打招呼，问候老总近情。朱老总对我说他自己的身体还不错。我当时感觉他气色精神确实挺好。

作为周总理追悼期间长时间守候在现场的警卫工作负责人，我还记得，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时，临近90高龄的朱老总到305医院作最后的告别，他站在周总理遗体前恭恭敬敬地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离开时显得心情异常沉重。

1976年2月，养成抄录领袖诗词习惯的我，还将报纸发表的朱老总《喜读主席词二首》，抄在小本子上。

……而此时此刻，又一位革命前辈，一代元戎将要撒手人寰了。

■ 据人民网

“863”计划出台背后： 两弹元勋“走后门” 上书邓小平

在对建议书进行逐字逐句的推敲后，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签上了名字。为了让建议书尽快进入领导人视线，他们没有一级一级往上呈报，而是走了一个“后门”：请邓小平的女婿，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的张宏，将信直接呈交邓小平。

30年前，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之于世，这就是开启新中国科技腾飞历程的“863”计划。它是怎样出台的呢？

■ 摘编自《解放日报》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掀狂澜

1986年3月5日，邓小平久久凝视着案头题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建议书。建议书由“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执笔，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联合签名。建议书所附亲笔信写道：“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

“星球大战计划”出台于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为改善美国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的守势，强力推动了该项计划的出台，其实质是以军备发展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全面振兴，进而在21世纪抢占战略制高点。美国这个大动作一出笼，在全世界掀起狂澜。苏联和东欧集团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领”；日本提出“十年科学技术振兴基本政策”；西欧17国联合签订“尤里卡计划”，提出建立“技术欧洲”……

1986年年初，国防科工委召开会议，就如何应对这一轮新的科技挑战展开讨论。专家学者们存在很大分歧。一种意见认为，也应该搞高科技。另一种意见则截然不同：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不如先搞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搞出来以后，中国也发展了，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利用美国的科技成果了。

科学家“走后门”上书邓小平

这类会议，王大珩已参加过许多次。因意见无法统一，每次都形成实质性方案。每参加一次会议，王大珩都添几分焦灼。一样焦灼的，还有同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陈芳允。两人达成共识：中国不能再沉寂下去了！王大珩说：“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吧！”

1986年2月，王大珩写成《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书提出：高科技发展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置身事外。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鉴于我国的经济情况，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强调储备与带动性。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要能在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

在对建议书进行逐字逐句的推敲后，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科学家签上了名字。为了让建议书尽快进入领导人视线，他们没有一级一级往上呈报，而是走了一个“后门”：请邓小平的女婿，

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的张宏，将信直接呈交邓小平。

政治局召开专门扩大会议

邓小平看了建议书后，批示：“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3月8日，国务院即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进行讨论，并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牵头组织讨论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经费问题，无疑是最棘手的问题。国务委员张劲夫约谈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问到这个问题。沉默许久，王淦昌才说了句：“一年能给2个亿就行。”尽管他们都心知肚明，用2个亿去发展高科技实在是杯水车薪，但一想到国内的经济条件，再多也难以启齿了。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邓小平和中央批的专款竟是100个亿！而中国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约2000亿元。

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7次会议进行反复探讨与论证，最后通过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扩大会议，批准了《纲要》。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科技计划。因为4位科学家上书的时间和邓小平指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该计划简称“863”计划。选择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来开始高科技的攀登，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在计划执行时，邓小平又提出了“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破例为计划题词

1988年8月，与“863”计划相衔接的“火炬”计划，即《高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实施。1991年初，有关方面曾向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提出，希望邓小平为“863”计划、“火炬”计划题词。但邓小平说，自己“已经不在第一线工作，不作题词”。1991年3、4月份，有关部门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了电视文献片《“火炬”计划巡礼》，连续播放5天。邓小平看了《新闻联播》中的这个节目，很感兴趣，要邓楠对“火炬”计划进行介绍。听后，邓小平说这个计划很好，愿意为这个计划题词。

闻讯，大家感到非常振奋，认为邓小平不可能为“863”计划和“火炬”计划分别题词，就把这两个计划合在一起送交邓小平。邓小平看后，写下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10个大字。